

张捷 主编

苏联文学

最后十五年纪事

1977 / 199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捷 主编

苏联文学 最后十五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文学最后十五年纪事(1977—1991)/张捷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004-9946-6

I. ①苏… II. ①张… III. ①文学研究—苏联—1977~1991
IV. ①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0613号

责任编辑 晓 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38千字

定 价 62.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说明

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在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负责人的叶水夫同志的主持下，全组同志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编写了《苏联文学纪事（1953—1976）》一书。此书于1979年出版后受到了苏联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以及关心苏联文学的广大读者的欢迎。在这之后，历任苏联文学研究室和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张羽、李辉凡和石南征同志都十分重视这项重要的基础研究，安排专人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苏联文学纪事的编写一直没有停止。到1987年底为止，先后编出了1977年到1987年这十一年的文学纪事，陆续发表在《七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动态》上。

到90年代初，苏联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91年底苏联解体，多民族的苏联文学也就停止其存在。这时回过头来看看苏联文学最后的十五年（1977—1991），纪事还缺1988—1991年四年。俄罗斯文学研究室在有許多重要的新问题需要研究的情况下，仍然重视编写纪事的工作，决定在编写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纪事的同时，把苏联文学的最后四年补齐并将其与已在上述书刊上发表过的十一年汇编成册付梓，这就是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苏联文学最后十五年纪事（1977—1991）》一书的由来。此书与上述《苏联文学纪事（1953—1976）》相衔接，一起构成了苏联文学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三十九年的比较完整的材料。如果再加上2007年出版的张捷编写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纪事（1992—2001）》，那么读者将可从中了解作为苏联文学主体的俄罗斯文学20世纪后半期将近半个世纪发展变化的历史。

本书记述的十五年大致可分为前八年（1977—1984）和后七年（1985—

1991) 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文学界尽管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总的说来,还比较平静,文学生活比较正常。后一阶段,尤其是从1986年起的后六年,由于戈尔巴乔夫实行他的“改革”,整个社会开始出现动荡,文学界随着也进入了“多事之秋”,因此这几年的纪事讲的事要多一些,篇幅相对要大一些。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与上述《苏联文学纪事(1953—1976)》基本相同,具体介绍文学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文学界的各种活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情况,理论问题、文学史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主要文学奖的评奖结果,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等。同时本书也基本上沿用了前一本书的体例。

本书是一本资料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客观和全面。具体说,在选材时不以编写者的好恶决定取舍,只要材料有价值 and 代表性,一律照录不误。同时尽可能引用原话,而且编写者不作评论。我们知道,苏联文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倾向和派别,到“改革”年代矛盾公开暴露出来,形成两大派对峙和进行激烈论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全面反映各个不同派别的思想观点及其活动,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描绘出整个苏联文学的面貌。本书在编写时对这一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本书还尽可能地介绍了国外俄罗斯文学和某些侨民作家的情况以及国内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另一种文学”的一些作家和作品,目的也是为了使读者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总之,本书的编写者把编写一本尽可能客观和全面地反映苏联文学最后十五年的真实面貌的翔实的资料书作为努力的目标。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冀元璋、吕绍宗、石南征、张捷四人。张捷除了补齐最后四年外,还负责全书的定稿工作。具体来说,一是做统一工作,做到全书体例、译名和重要名词术语的统一;二是进行认真校订,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讹;三是查缺补漏,进行必要的增补,力争做到无重大遗漏。前十一年已发表的材料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补充,尤其是在“改革”已在实际上开展起来的1986年和1987年这两年,由于文学界内部矛盾激化,风波迭起,情况复杂,问题较多,因而改动和增补得比较多。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冀元璋同志。他已于今年5月去世,我们为失去这位亲密的老同事和老战友而深感痛惜。长期以来,他一直从事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现状的研究工作,发表过许多文章,并且积极参加文学纪事的编写。相信他的辛勤劳动的果实将会受

到重视和珍惜。

编写文学大事记如同修史，是一件重要的和责任重大的工作。尽管编写者们认识到这一点，对它采取认真严肃的态度，并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因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编出的纪事可能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同行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2009年9月10日

目 录

1977—1991 年苏联文学纪事	(1)
1977 年	(1)
1978 年	(24)
1979 年	(47)
1980 年	(72)
1981 年	(97)
1982 年	(122)
1983 年	(145)
1984 年	(166)
1985 年	(186)
1986 年	(209)
1987 年	(228)
1988 年	(257)
1989 年	(292)
1990 年	(325)
1991 年	(356)
附录一 1977—1991 年去世的重要作家和批评家	(389)
附录二 主要文学奖获奖者名单	
一 列宁奖金	(399)
二 苏联国家奖	(400)
三 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403)

1977—1991 年苏联文学纪事

1977 年

1977 年是十月革命六十周年。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伟大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的决议，文学界根据决议的要求，开展了各种庆祝活动。在理论研究方面，Д. 马尔科夫发表了《真实表现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一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同时报刊上还刊登了一些关于六十年来苏联文学发展道路的总结性文章。就文学创作来说，本年属于正常年景。在长篇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有 B. 利帕托夫的《伊戈尔·萨沃维奇》，其中塑造了一个患所谓“幼稚病”的干部子弟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П. 普罗斯库林的两部曲的后一部《你的名字》反映了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直到 70 年代初多方面的社会生活。M. 科列斯尼科夫完成了工业题材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培养部长的学校》。青年作家 Ю. 斯科普的长篇小说《安全技术》提出了苏联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课题，批判了某些干部明哲保身的哲学，值得重视。在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中，E. 诺索夫的中篇小说《乌斯维亚蒂村戴头盔的人》显得比较新颖。Г. 马尔科夫的中篇小说《风中芦苇》揭露了当前苏联青年不安心农村的现象。在戏剧和电影方面，大型历史故事影片《自由战士》可以说是影片《解放》（1970—1971）的续篇，它反映了 1944—1945 年间东欧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影片《信任》则通过对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独立的历史事实的描写，宣扬了“赫尔辛基精神”。在诗歌创造方面，比较突出的有 E. 伊萨耶夫的叙事诗《记忆的远方》。

1月20日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纪念苏共中央《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发表五周年。

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兼该委员会主席 B. 奥泽罗夫致开幕词，他指出：“文艺批评的首要责任是坚决地和彻底地为党性原则而斗争，确立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准则，始终不渝地关怀文学界社会政治积极性的提高。”会议就如何完成上述任务、文艺批评有哪些成绩和缺点、今天还有什么问题等待解决等方面展开讨论。委员会另一主席 Л. 诺维钦科作会议总结。他说：“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结果与其说是总结了苏共中央 1972 年发表历史性决议以来取得的正面经验，不如说是认清了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以便不断提高文艺批评这一艺术发展和社会斗争的积极力量在当今世界上的声望。”（《文学报》2月2日）

《文学报》于 1 月 26 日发表了题为《文艺批评的崇高职责》的专论。文章在列举 1972 年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文艺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著作后指出：“苏联文艺批评近年来取得的成绩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缺点都根除了，今后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具体说，“文艺批评还没有充分利用文学过程的实际材料来宣传苏联生活方式，更有效地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道德和美学观点作斗争”；“在理论上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潜力，但在具体分析这个方法的创作实践时则违背这一点，这种现象至今尚未消除”；“简单化、庸俗化、审美感觉‘失灵’，另一方面，对文学现象采取直觉主义和主观主义态度，这一切也还没有完全根除”；“最近有些作者采取一种大有问题的方法论，追求为新奇而新奇，对诸如历史、道德、人物的精神世界等本身相当重要的问题，论述得极其含糊不清，这样的评论文章已成为一种时髦”；“书评的水平仍然不够高”，很多书评仍然有“恭维人的恶习和模棱两可的现象的烙印”。文章在谈到培养文艺批评方面的接班人时抱怨说，有些青年“宁可做科研和教学工作，不肯上文艺批评‘第一线’”，这就使得“新补充的熟练干部的数量远远不够”。

1月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的决议，苏联各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都以显著地位全文刊登了这一决议。

决议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回顾了苏联建国六十年来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决议要求全

国开展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责成政府各个有关部门、各个文化团体和创作协会（其中包括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根据决议精神，从各自的具体情况出发，制订十月革命六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并立即付诸实施。决议规定庆祝活动的计划应包括举办向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献礼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评选活动，发给优胜者以国家奖金。决议还要求各报纸杂志，各出版社、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宣传工具，系统地刊登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出版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广播和放映有关这方面的节目。（《真理报》2月1日）

决议公布后不久，有的地方的作家组织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贯彻决议精神的各项措施。不少文学报刊纷纷开辟专栏，开始大量刊登作家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各种纪念性文章。

同月 《文学问题》杂志第1期发表Д. 马尔科夫的论文《真实表现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其中进一步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开放体系”的理论。

文章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组成部分在内，是一个发展的灵活的体系”；“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来说，客观地认识不断发展着的现实是没有止境的，题材的选择以及在采用能够反映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法上也是没有限制的。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历史地开放的”；二、“这个体系的核心，它的哲学基础，是对世界和人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列宁的艺术党性原则”；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广阔性是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本身提供的，是由艺术真实性的要求提供的”；“真实性的概念不是某种静止的东西，正如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概念是变化的和发展的一样，我们是从历史发展中来看艺术真实性的”；四、“别的体系的诗学成分加入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系中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般都是可能的”。

作者最后对这一理论作了如下的概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的美学体系，它的特点是艺术真实性的广阔的标准：它对于客观地认识社会生活的规律性的发展而言，是开放的，同时对于体现这种发展的艺术形式而言，也是开放的。正是在这一体系联系中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表现手法领域里有可能去结合过去和现代的其他艺术流派的

成果。”

2月1日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根据苏共中央《关于培养青年创作者的工作》的决议精神培养接班人问题。

这是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委员会主席 O. 谢斯京斯基主持会议并发了言。他指出，苏共中央决议要求作家对培养文学接班人的工作采取“深切关心和创造性的态度”，作家应当“去发现真正的天才和具有卓越创作才能的人，帮助他们成长”。他还谈到有关培养和支持青年作家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发言的还有 A. 阿列克辛、P. 卡扎科娃、B. 波列伏依等二十四人。会上苏联作协第一书记 Г. 马尔科夫向 A. 利哈诺夫发了列宁共青团奖金。利哈诺夫是《接班人》杂志主编，这次得奖的作品是儿童读物《音乐》、《家庭状况》和《我的将军》。（《文学报》2月9日）

2月9日 据《文学报》报道，文学出版社为纪念十月革命六十周年，决定编辑出版了大型诗集《苏联诗歌六十年》。参加编委会的有 M. 卢科宁、C. 纳罗夫恰多夫、M. 利沃夫、Г. 列吉斯坦、A. 米哈依洛夫、B. 图尔金、Л. 克利莫维奇等。

计划编辑出版的诗集共分四卷。前两卷收三百二十三位俄罗斯苏维埃诗人的作品，后两卷收八百零四位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四卷合计收诗两千四百多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集的后两卷，这将是迄今为止用俄语出版的少数民族诗选中最全的一种，有七百多人参加了将这些诗译成俄语的工作。

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刊登 A. 梅特钦科题为《以宽阔的历史尺度来衡量》的文章。

文章说，“天才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民族财富”这个论断，“总结了艺术发展的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它“为党性和人民性原则有力地作用于艺术的发展别开了生面，而党性和人民性则是社会主义美学最重要的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艺术创作成为民族财富——这是它的人民性最重要方面之一”，而对“新型艺术家”来说，“人民性和党性成了决定社会主义艺术的灵魂和创作探索的方向的因素”。文章接着指出，“苏联文学不能忽视这样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如

过去互相对立的概念（譬如民族的和国家的）或者相差很大的概念（民族的和国际主义的）正在接近起来；这一过程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正在加速进行，然而不是一个概念排斥或代替另一概念，而是互相丰富，各自扩大作用的范围”。文章还指出，尽管俄罗斯文学对苏联许多民族的文学的形成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但今天可以看到一种“反馈现象”，即“各民族的文学正在对俄罗斯文学产生着影响”。文章说：“在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阶段，文化交流正在活跃起来，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开展，在这种条件下特别需要记住：……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和妥协。”文章强调说，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能够表现“科技革命的人道主义本质及其在新社会中的作用”。文章还谈到“苏联生活方式”问题，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面前提出了研究这个新的生活方式及其固有的复杂性和典型表现的迫切任务”。文章列举了许多作品来说明“苏联文学在大胆解决道德问题上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已进入成熟时期”，在反映这一过程中已“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可供理论概括，特别是解决现实主义的最重要问题——典型问题”。

3月2—3日 苏联作家协会召开全苏作家组织领导人和文学报刊主编会议，讨论贯彻苏共二十五大决议和纪念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等方面的任务。苏共中央文化部长B.沙乌罗和副部长A.别利亚耶夫，苏联文化部第一副部长Ю.巴拉巴什等参加了会议。

作协第一书记Г.马尔科夫致开幕词。他强调了苏共二十五大提出的“天才是民族财富”这一论点的“原则意义”。他说，首先要“发现天才”，“帮助他磨炼、成长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同时也要“对天才负责，保护天才”。马尔科夫批评作协的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党性的激情和组织性”，创作团体“工作没有生气，搞形式主义”，“作家协会的领导和文学报刊之间互不联系”，某些党组织“不联系群众，很少做思想工作”，对所谓“复杂的”作家“不闻不问”。他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作家组织内“政治学习削弱了”。他要求各级作家组织和文学报刊为迎接十月革命六十周年和贯彻苏共二十五大决议“积极工作”，“把所有作家都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同人民打成一片，成为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真正歌手”。

作协理事会的几位书记作了报告或发了言。O. 谢斯京斯基在报告中主要谈青年作家的培养问题，他宣布最近四年将要分别召开青年散文作家、诗人、剧作家、特写作家和批评家会议，创办《文学学习》杂志。B. 奥泽罗夫谈文艺批评问题，他列举了近年来这方面的成就，如编写了苏联多民族的文学史，出版了很多专著，填补了对20年代的研究上的许多“空白”，但对30年代注意得不够。Ю. 苏罗夫采夫着重谈了苏联文学的国际化 and 民族特点问题。P. 卡扎科娃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文艺书籍的宣传推广问题，H. 费德林则谈了国际交流问题。（《文学报》3月9日）

3月22—23日 《文学报》和哈萨克作协在阿拉木图联合举行“圆桌会议”，讨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和各民族文化的命运》。

与会者就“国际主义”与民族性、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其相互影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很多发言谈到了六十年来苏联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和“苏联人民这一历史共同体”的形成，列举了各民族在文化上取得的成绩，赞扬了各民族之间的“亲如一家的感情”。但是有些发言中也透露了不满情绪。如有的作家抱怨不少文学作品和电影写上一个少数民族的人物仅仅是为了保证作品有一点“民族色彩”，而不是为了真实地反映该民族的生活。有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会上强调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指出：“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一宣布自己是最高的文化并限制相互作用，那么它立刻就会停止上升而走向衰落”。（《文学报》4月27日）

2—3月 《十月》杂志第2、3期连载 O. 斯米尔诺夫的长篇小说《告别》。

小说描写1941年6月至12月乌克兰地区一支游击队的战斗历程。苏德边境某边防哨所在开战第一天就被摧毁。幸存的所长斯克沃尔佐夫中尉英勇奋战，在被俘后侥幸逃脱。

当他在林中养伤时，看到登有斯大林7月3日演说词的传单，受到启示与鼓舞，于是召集了被打散的士兵，在高洛羌斯基森林建立起游击队营地，与地下区委取得了联系。游击队在敌后破坏交通线，袭击货仓，侦察敌情，取得很大成功；但同时也受到优势敌人的压迫，只得突围迁移到别处去。在困难时刻，通过地下区委，他们得到莫斯科运来的

武器弹药和党中央的关怀。尤其是斯大林11月6日关于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的报告、11月7日在红场阅兵和讲演，给了他们很大鼓舞。但终因寡不敌众，游击队再次被打散。这时，中央派代表前来，不仅解决了斯克沃尔佐夫在战争初期曾因备战积极反受指控的冤案，而且决定派他去接受专门训练以担任敌后间谍工作。中尉向队员们告别，想到了边防军的一种信念：“无论你被派到哪儿，你必须回到你曾保卫过的边境，因此你不会与边境告别。”

苏联评论界认为，作家是以“今天人的眼光”来展示他的主人公，是从“客观的、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叙述的。（《文学报》8月17日）

2—3月 《新世界》杂志第2、3期连载 IO. 斯科普的长篇小说《安全技术》。

苏联北方某地一个磷灰石联合企业的经理米赫耶夫原来打算在部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提出生产管理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觉得发言要冒风险，还是“明哲保身”为好。会后他内心很不平静，结果心脏病发作，住了院。经理的职务由总工程师克里亚克文代理。克里亚克文和米赫耶夫一样，也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认为“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今天”，决心担当起改革的任务。后来部里召开全苏采矿业积极分子大会，克里亚克文在会上慷慨陈词，揭露了整个工业系统生产管理上的弊端，终于提出了原来米赫耶夫未能提出的改革意见。

IO. 斯科普是一位青年作家，毕业于乌拉尔大学新闻系，曾在伊尔库茨克的报社工作过。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评论界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小说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还是有可取的地方，但都一致认为作者提出了经济管理方面和社会心理方面的重要问题。《文学报》编者认为“小说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创作道路上的重要路标”。Г. 马尔科夫也基本上肯定这部作品，指出“小说的很多章节写得很有才气，作者对环境是熟悉的”。（《文学报》6月15、29日）

4月中旬 苏联文化部部务委员会和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戏剧》杂志的工作。

会议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文化部长 П. 杰米契夫和苏

联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 Г. 马尔科夫共同主持。杰米契夫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戏剧作品和上演剧目问题。《戏剧》杂志主编 А. 萨伦斯基详细介绍了编辑方针。他说，“从 1973 年第 1 期起，杂志每月刊登两个剧本，同时尽量刊登青年作家的处女作”。他特别指出杂志对“劳动题材”和“生产题材”的重视。他说，“几乎所有在剧院上演剧目中占主要地位的”写这个题材的作品，都是在《戏剧》杂志上发表的，其中包括 Г. 鲍卡廖夫的《炼钢工人》、А. 格利曼的《党委会议》、А. 格列勃涅夫的《一个能干的女人》、М. 沙特罗夫的《明天的天气》、М. 伊勃拉吉姆别科夫的《中生代石油的故事》、А. 列瓦达的《你好，普里皮亚季河！》、Г. 普里耶杰的《我强迫你爱莱尼斯》等。

与会者在肯定《戏剧》杂志的工作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例如杂志上还可见到“肤浅的材料”，编辑部在评论戏剧作品时“没有坚持高标准”，“在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不合格的作品作斗争中不能始终不渝地表现出应有的原则性”，认为“杂志应当更好地与戏剧事业的实际相结合，在与资产阶级美学概念作斗争时提高进攻性”。（《文学报》4月20日）

4月26日 莫斯科作家组织召开总结改选大会。

理事会第一书记 Ф. 库兹涅佐夫在会上作报告。报告肯定了莫斯科作家在文学创作、文艺批评和文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分析了他们的创作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思想工作”。代表会议选出了新的理事会，Ф. 库兹涅佐夫重新当选为第一书记。（《文学报》5月4日）

4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发表苏联文化部第一副部长 Ю. 巴拉巴什的文章，题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艺术文化发展的某些方面》。

文章说，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因素在社会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这一过程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客观规律性”。文章接着说：“无疑，我国经济上的成就和人民福利的提高，促进着艺术文化的进步。可是也存在着一种‘反馈’现象：我们要继续前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它对社会生活、对苏维埃人的成长、对他们思想和道德信念的形成所起作用的加强。”文章进一步指出，在现在的条件下，文化的发展“也与科技革命紧密联系着”，“劳动的强

化及其自动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这就为他们经常地和更多地接触文化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因而也为一个人全面地、和谐地发展，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创造了良好的前提”，而文化发展的上述特点，使得“它的功能的侧重点有了变化”，“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参与培养人的工作成了艺术文化最重要的功能”。文章认为，文艺理论对“艺术的传播和享受及其对人们所起作用的最终结果”等方面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文章提出，一方面，要把文化“当作一个多成分的、有许多分支的、同时又是完整的体系”来研究，另一方面，还要把这种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首先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种学，甚至经济科学”结合起来，而且应该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行“合作”。文章谈到“思想斗争”问题时强调指出，“缓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意味着解除思想武装。相反，思想斗争的尖锐和激烈程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在这场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文化应当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月 《旗》杂志第4期刊登了 Ч. 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花狗崖》。

小说采用民间故事的形式，写远东沿海的尼福赫人（旧称基里亚克人）出海捕猎的经过。一个名叫基利斯科的尼福赫孩子快成年了。老族长奥尔甘亲自带领他和他的父亲、叔叔一起出海，向他传授航海和渔猎的技术。他们从花狗崖附近乘小船出发，顺利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捕到一只海豹，然后继续向第二个目的地前进。突然天气变了，海上起了风暴，浓雾积久不散，小船迷了航。粮食和淡水快要用完了，饥饿和干渴严重地威胁着四个人的生命。为了给孩子省下淡水，使他增加一分活命的希望，族长、父亲和叔叔自我牺牲，先后跳了海，只剩下基利斯克一个人。最后雾散天晴，孩子终于一个人顺利地返回了花狗崖。如同作者的另一部小说《白轮船》中插入一个鹿母的故事一样，这部小说也插入了一个鱼女的故事。

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B. 列夫钦科指出：“小说最重要的方面是忘我地为他人作牺牲的利他主义。”（《文学报》5月18日）П. 列别杰娃为《小说报》转载《花狗崖》写的前言中说，这部作品“最大的成功”是“对人和对人的思想的永存的信念”，认为它的问世“标志着艾特马托夫的创作达到了新的水平”。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

A. 阿宁斯基把这部小说作为具体例子之一，来说明近来有些作家热衷于写神话、传说和寓言，忽视了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文学报》1978年3月1日）于是在《文学报》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散文中“现实性和假定性”的争论。艾特马托夫坚决不承认自己离开了现实主义，抱怨某些人“对当代现实主义的道德美学内容理解得太狭隘和太肤浅”。（《文学报》1978年3月29日）

5月16—17日 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书记处在伏尔加格勒举行“巡回会议”，讨论俄罗斯联邦文学中的道德问题。

理事会主席 C. 米哈尔科夫致开幕词。理事会第一副主席 Ю. 邦达列夫作题为《文学中的道德》的报告，理事会书记 C. 奥尔洛夫作关于诗歌的报告。

米哈尔科夫说：“道德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凝固的熔岩。道德规范永远带有社会性。它永远处于变动之中，它随着社会本身而存在、发展。作家的任务在于深入了解这种变动，揭示出发展的前景，预见到明天。”他接着说，“研究一个人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探索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采用简单的方法和片面的态度”。他指出，“这次书记处会议的任务是揭示当代文学过程在这方面的好的征兆，进一步明确俄罗斯联邦文学创作的前景”，同时，“不放过反面的倾向——如说教、片面性、简单化、离开社会作用解释道德题材的企图等”，也是“极其重要的”。米哈尔科夫还说：道德题材“给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广阔天地。实际上不管写什么题材，不管选择什么人物、问题、情节发生的环境和地点，都有可能写道德问题，因为真正的文学从来不能离开它的主要方向——研究人本身。”他强调指出，一个作家“永远应当记住，不存在一般的道德，不存在一般的善良和正义，不存在一下子耸立于全人类之上的道德范畴”，“存在着共产主义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任何人都不能在两者之间画等号”。米哈尔科夫还谈到青年的教育问题，认为“对年青一代进行道德教育越来越成为一项首要任务”，同时提出作家在进行教育的同时“也应当关心一下自己的道德面貌”。

邦达列夫着重指出道德在“科技革命时代”的意义。他说：“整个世界的命运和前途取决于道德的健全。”奥尔洛夫强调了诗歌的“公民